

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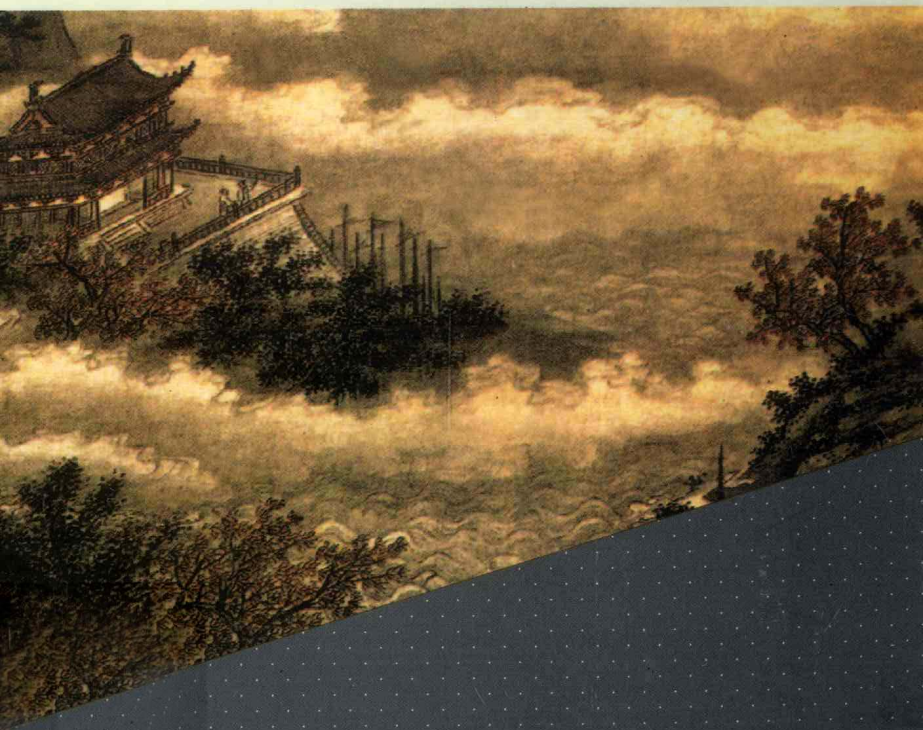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出版社

欧阳修卷

主编：王运熙选注：廖仲安邱少华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欧阳修卷

廖仲安 邱少华 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欧阳修卷/廖仲安
邱少华选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7
ISBN 7-5008-1915-3

I. 新… I. ①廖… ②邱…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43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5
印 数: 1~5060 册
定 价: 15.00 元

总 序

王运熙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唐宋散文，特别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八大家散文，无可辩驳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承秦汉古文的朴素自然而济以条畅，弃六朝骈体之繁缛雕琢而有所酌取，形成一种很适合于表情达意的新文体，这种文体长期为后世所颂扬，并被视为散文创作的典范。

最先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合在一起，并予以大力推崇的是明初人朱右。他以八人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彰善制恶，褒是去非，可以为后世法式，故汇编其作，成《八先生文集》。嘉靖、隆庆年间，唐顺之竭力推崇唐宋散文，选先秦至宋文章为《文编》，于这一时期也标举韩柳欧苏等八家，并用以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古文派抗衡。稍后有茅坤服膺唐氏之论，遂专取韩柳等人文编成一集，径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唐顺之等唐宋派的提倡，《文钞》选录也较得当，其评语足为初学门径，流传颇广，“八大家”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广泛传扬，他们的文章也因此家弦户诵，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中国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语言一般朴素自然。至东汉，

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日趋发展昌盛，除重骈偶外，还讲求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在这段时期内，骈文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期内骈文也产生过不少长于抒情写景、语言美丽的佳作，但因过分重视形式，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抒情达意的功能。当时虽有少数人起来批评和反对骈文，但均未奏效。至唐代，社会上流行的文体仍为骈文。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散文家，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均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愈少从伯兄韩会游，为梁肃及萧颖士子荐所赏识，与李华从子李观结为至友。前辈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他用很大力气来提倡古文。基于正在走向上升的庶族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热情、社会理想和政治视野，他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正需师古，词必已出。词不管难易，唯求其是。文章必须是内在志气充沛的表现，所谓气盛而言宜。与此相联系，他还认为大凡不得其平而鸣的作品，尤有真实情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由于他行文能自树立，不但立意深刻，议论精到，且能兼采先秦汉代各家之长，自铸新词，风格浑灏宏肆而不失多样化，因而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韩愈广事交游和招收弟子，传授古文，当时跟从他写作古文的士子颇多，古文创作在当时形成一种相当大的潮流。

在此期间，柳宗元的功绩也十分巨大。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基于进步的哲学

观、社会观，他还提出辅时及物为道之说。他重视作家的修养，重视认真揣摩和学习古人文章，于儒家经书和西汉古文外，兼取诸子散文和《楚辞》，主张“有乎内而饰乎外”（《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临文以敬，旁推交通，使他的散文别具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果说韩文气势宏肆，不可控驭，他则峻洁幽深，滋味醇厚。又由于他与韩愈一样，也与一时古文家如刘禹锡、吕温、韩晔、吴武陵等人相往还，他虽谦称才能勇气不如韩愈，故不为人师，实际上还是努力奖掖后进，当时后学之士追随他学习的颇多，经他指点，为文都有法度。所以，他之成为古文运动的又一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他与韩愈虽在政治主张等诸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为人、为学上彼此钦敬，各自对对方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由于领袖人物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一批追随者积极响应，一场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同时在深层意识中有维护唐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古文运动，遂演成相当巨大的声势，韩、柳两家散文也由此被人奉为古文的典范。

中晚唐时代，在韩愈影响下，出现了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家。但他们的成就均不及韩柳，有的更是一味求奇，使文风陷入晦涩而缺乏号召力。晚唐五代以迄宋初，仍是骈文势力强大。在宋初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西崑派，其诗文均崇尚骈偶，文辞华艳。宋代前期，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出来反对浮华文风，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直到欧阳修出来，不但摒弃“西崑体”，反对六朝以迄唐代的崇尚骈俪声律之文体，还注意克服倡言古文者好为怪僻之语的“太学体”，取韩文为范式而兼采骈文，以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同时，他承韩柳重道之说，以为道胜文至，但又极重视散文创作自身的文章特点，不抹杀古

文的独立地位。由于他凭藉贡举的优势地位，作有倾向性的提倡，使浮艳文体一时失去市场，以怪僻知名者也黜落殆尽。他还以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如苏轼父子这样的人才。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和主持风气，文风变而趋于复古，而这复古与韩愈一样，是以复古为革新。

当然，苏轼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的理论响应，特别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宋代散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在上述诸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经由宋代六家大力有效的提倡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突出的创作实践，一种新的古文观得以确立。一方面，它继续崇信韩愈所标举的儒家之道，同时注意赋予这种道以更广泛的现实内容，使之“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另一方面，更重视古文独立品格的实现，既要求它事信而载大，又要求它有自然流畅的审美品位。在这种古文观指导下，诸如欧阳修的条畅绵邈，苏轼的雄肆通脱，苏洵的驰骤博辩，还有曾巩的平正婉雅，王安石的简洁峭拔，苏辙的冲和澹泊，皆各逞其姿。他们以这种自然平实又深切著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谈兵议学，记叙山水，宣泄性情，既不完全排斥骈偶藻绘，但又不苛求属对精切缜密；既不排拒详赡博达，但又截然无取繁富冗长，不明体要。并且，比之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他们的散文指事析理，更求洞彻，写景抒情，每趋清畅。倘若说，唐人作文更重字句的锤炼和气势的营建，他们则更多地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从容不迫的节奏和体调，造成一种清新明朗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虚实字的研究和运用，对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和总结，对古文本身式体的创设和拓展，都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在他们手中，确实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上所述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散文的理论建设来说，还是从实践积累来说，它都给后人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后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韩、柳古文理论和创作是欧阳修等人再兴古文运动的精神榜样自不必说，即此八家散文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深远的。元明清时代，虽有一些人无取乃至排斥唐宋古文，以秦汉文为至上的样板；还有一些人则更以复兴骈文为职志，排斥一切散体古文，称“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后》），但在明代自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作者，大抵都是沿韩柳及欧苏古文一派而取得实绩的。清中叶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及后起的梅曾亮、恽敬、曾国藩等人，也是从八大家古文中得到无穷的滋养，其沾溉来叶，垂范后昆，厥功甚伟。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编选了这一套唐宋八大家书系。所选篇什大抵录自各家别集，大多数为当日及后世有定评者。它们既体现了八家古文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又关涉唐宋两代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关键和主体。限于篇幅，尚有一些佳作未能悉数选入，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前 言

廖仲安 邱少华

我国散文发展到唐宋两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理论建树是开创性的，创作成果是先秦前汉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人物的唐代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晚唐五代，文章道弊，又需要挽颓起衰。至北宋，以柳开和王禹偁为先驱，以欧阳修为领袖，尹洙与苏舜钦等人为羽翼，曾巩、三苏、王安石为强劲的后继的又一次复古运动，以更加浩大的声势展开，并取得了比唐代更加普遍而巩固的成就，从而确立了古文在文坛上的地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青壮年时代，因敢于言事，不避权贵，积极支持改革，曾两度被贬：景祐三年（1036）由馆阁校勘降为峡州夷陵令；庆历五年（1045）由龙图阁直学士降知滁州。自至和元年（1054）48岁迁翰林学士后，仕途顺利。嘉祐五年（1060）54岁兼翰林侍读学士，拜枢密副使（地位相当于副相）。六年（1061）55岁任参知政事（副相）。八年（1063）英宗即位，进阶金紫光禄大夫，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称号。治平四年（1067）61岁时神宗即位，力请离朝，以观文殿学士进刑部尚书知

亳州，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熙宁元年（1068）62岁以后，转兵部尚书知青州、蔡州。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1072）闰七月，病逝于汝阴，终年66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追封兖国公。

欧阳修从青年时代起即有志于文章复古，搜寻韩集，学习韩文，致力于古文创作。他成就很高，成名很早，影响很大；后来地位日隆，官至副相，奖掖提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唐宋八家，宋占其六，除他自己外，其余均以受其褒扬而声名大振；还有，欧阳修曾利用知贡举（主持尚书礼部的进士考试）的行政权力，打击时文（即所谓“太学体”），淘汰文风险怪的士子，一时引起震动。“文士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变而复正。”（神宗实录本传》墨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古文终于战胜时文，主宰了文坛。范仲淹说：

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风雅最盛。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以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复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正。（《尹师鲁河南集序》）

其序次自唐至宋古文盛衰与宋代复古运动发展之轨迹（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颇为清晰而有条理。苏轼的《六一居士集序》则热情洋溢地颂扬了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的功绩：“韩愈之后，二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孔氏，著礼乐

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愧于古；士亦固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磨濯……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叶涛《重修实录本传》（朱本）和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都明确肯定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及其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与贡献：“自修文一出，天下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①

在文学理论方面，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观念，强调孔孟六经之道和文以明道。不过，他对“道”的理解，要更宽广些。他反对空谈大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弃百事不关于心的学风，注重文的实用价值，指出“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之一）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因此，他给后进指点作文之要，多以先道后文为言，希望他们加深儒道的修养，以充实自己的内心，“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甚至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不过，欧阳修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道学家。他重道亦重文，而主张重道的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为了文。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

^①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转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

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并反复举例论证言（内容）与文（形式）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强调“言之难行”，并归结到“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不文，“则其传也不章”。他由此更进一步，在注意文与道统一的同时，强调文的独立的地位，认为立德、立动、立言不完全是一回事，是可以分别言之的，有德者不必有言。文自有其独立的客观的价值标准，不可仅凭主观的好恶随意褒贬，“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苏轼《答谢民师书》）这些见解，划清了与道学家将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对立起来，声言“作文害道”，是“玩物丧志”的倾向的界线，指导了当时与后世的古文创作，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在散文创作方面，欧阳修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成为一代宗师；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为散文发展史上的三颗明星。宋人吴充说：“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欧阳公行状》）韩琦说：“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文忠欧阳公墓志铭》）明人艾南英说：“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再与周介生论文书》）清人钱谦益说：“不读韩欧，不知《史》、《汉》之所以为文也。”（《震川先生文集序》）一致肯定了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正所谓“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欧文最明显最具个性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易自然，雍容畅达。唐宋古文第一大家韩愈，为了救弊起衰，力挽狂澜，特别着眼于务去陈言，自铸伟辞，以求夏夏独造之效，他的文章既有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怪怪奇奇的一

面,后者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如唐代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李观、皇甫湜、沈亚之、刘蛻等人为文,往往追求奇险,流入艰涩,格格不能自达。欧阳修扬弃了韩愈的怪怪奇奇,而创造性地发展了文从字顺的特点。平易畅达是他的文论的重要主张,也是他的创作的基本特点。朱熹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明确指出欧文平易而畅的风格。欧阳修提倡平易的文风,并身体力行,同时也提倡平易的学风和书风,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刚直不阿,难进易退;学风是朴实的,崇尚简确,不立异论;文风也追求雍容平易,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这三者也是结合在一起的^①。欧阳修散文所开创的平易畅达之风,为宋文的发展铺就了一条宽坦的道路,给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第二,曲折多姿,波澜荡漾。苏洵对比分析了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文章的风格,指出欧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段已成为欧文风格定评的话,极富辩证精神。其主旨在于归纳欧文“条达疏畅”与“容与闲易”的基质,同时又指出了条达疏畅之中的“往复百折”,容与闲易之中的“急言竭论”,或者说“峻洁而又自然,流畅而又曲折^②。”平易畅达不是平铺直叙,静水无澜;从容闲易不是咿缓冗疲,不

^① 郭预衡《论欧阳修》,《古代文学探讨集》。参见《欧阳修的文风、学风和书风》,《光明日报》1982年10月12日。

^② 郭预衡《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宋代散文随笔之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见精警。曲折多姿，波澜荡漾这个手法，不仅在《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等篇幅较长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即使在《读李翱文》、《记旧本韩文后》一类的短章中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金圣叹评《朋党论》云：“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勃郁；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余诚评《醉翁亭记》云：“风平浪静之中，自具波澜潜洄之妙。”（《重订古文释义》卷八）见到的都是平易中的峻洁，畅达中的波澜。

第三，一唱三叹，情深韵长。情感是欧阳修布局谋篇、组织材料的重要手段；重韵律，重咏叹抒情，是构成欧文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他的各体文章，都能体现这个特色。《张子野墓志铭》、《与尹师鲁书》、《释秘演诗集序》、《江邻几文集序》、《王彦章画像记》、《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无不具有一唱三叹，情深韵长之美。即使是政论文与史论文，也不只是单纯的说理。《准诏言事上书》是奏章，其中不乏以情韵动人的唱叹之辞，如：“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困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史论，以“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开篇，中间综述史事，通过“可谓壮哉！”与“何其衰也！”对照中有强烈的抒情，深沉的叹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最后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仍以感慨出之。这样的例子不少。刘熙载评曰：“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隐之意。”并推而广之，指出“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旨趣为多。”（《艺概·文概》）这是

以《楚辞》的强烈的抒情性来说明欧文一唱三叹与情深韵长的特色。前人评欧文，都特别注意其长于感慨抒情。如刘大槐说：“欧公长于感叹。”（《岷山亭记》）“以……感叹成文，淋漓勃郁。”（《张子野墓志铭》）“情韵之美，欧公独擅千古，而此篇尤胜。”（《江邻几文集序》）刘氏之评，大体可以代表明代唐宋派和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的认识与激赏。

欧阳修一生的业绩是辉煌的，多方面的。他青壮年时代关心时事与朝政，坚持进步，锐意革新，参与过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英宗在位前后，有定策辅弼之功。高风亮节，为时所重。他是北宋开风气的学者，历史学家（著有《新五代史》和与宋祁合作的《新唐书》），金石学家。作为文学家，他又是堪称大家的诗人和词人，而以散文创作成就最高。《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收《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包括《河东奉使奏草》上下，《河北奉使奏草》上下，《奏事录》，《濮议》四，《崇文总目叙释》，《于役志》，《归田录》二，诗话，笔说，试笔，《长短句》三），《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总计一百五十三卷。

本书选注欧阳修散文，选目力求全面。第一，参考了自吕祖谦《宋文鉴》、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姚鼐《古文辞类纂》以来诸家选本，尽量包涵传统名篇。这些作品正如精金美玉，集中反映了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与艺术个性，震动当时，润泽后世，数百年间传诵不息。第二，欧文内容丰富，众体兼备，本书选目亦兼顾其多样性。除重视《居士集》和《外集》所收赋、论、碑志、记、序、上书、杂题跋的选录外，还从《新五代史》列传与序论、内制、表奏书启、奏议、《归田录》、

《诗话》、《笔说》、《试笔》、《书简》中精选了若干篇（则），其中包括少数骈体文。凡是属于“文”这个范围的，几乎都顾及到了，务期能够反映欧文的全貌，展示作者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学观，及其思想、品格、生活、交游等方面的情况。第三，本书还选了欧阳修的若干早期作品，如《大匠诲人以规矩赋》、《红鹦鹉赋》等，可与从事文章复古以后的作品比较研究，从一个方面了解作者的创作发展的轨迹。本书文字，以《四部丛刊》本为依据，同异之处，择善而从。明显的错字，迳自改正，不出校记。题解除揭示写作背景与主旨外，亦涉及方法与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力求简明而切实，重在普及，避免繁冗的徵引；偶有考辨，亦系理解本文所必需。注释方面，参考了前人及时贤的成果，有所吸取，亦有所匡补。疏漏错讹之处，敬祈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一九九六年中秋后八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总序	王运熙
前言	廖仲安 邱少华
大匠海人以规矩赋	1
贾谊不至公卿论	5
伐树记	10
戕竹记	13
养鱼记	16
丛翠亭记	18
红鹦鹉赋并序	20
送梅圣俞归河阳序	25
杂说三首并序	27
上随州钱相公启	30
上范司谏书	34
述梦赋	39
李秀才东园亭记	41
樊侯庙灾记	44
与石推官第二书	47
与高司谏书	51
与尹师鲁书	56
读李翱文	61